

學術良知高於啟蒙

◎ 張曉明

錢永祥：《縱慾與虛無之上——現代情境裏的政治倫理》（北京：三聯書店，2002）。

「作為學術工作者，我不敢奢望自己的思考努力有所發明，不過我希望自己不要走上庸俗無聊的路子。」《縱慾與虛無之上》的作者特別強調「庸俗」與「無聊」還是頗有警示意義的：

人的尊嚴，正是靠熱情與懷疑的適當配合而支撐起來的。尊嚴繫於擔當，可是沒有懷疑與熱情，豈有餘地發揮坦蕩蕩的擔當？在這個脈絡裡，庸俗與無聊的心態特別需要提防。庸俗者沒有懷疑，所以無所擔當；無聊者缺乏熱情，所以不求擔當。庸俗者以為意義與價值的問題業已解決，生命不過是隨著主流逐波弄潮；無聊者則根本不識意義與價值的追求包含著徒勞的悲劇成分，以為生命本身原是輕鬆幸福的盡興一場。

這也是我作為讀者對作者肅然起敬的根本原因。畢竟，在人慾橫流的市場上，在學術泡沫扶搖直上的今天，在有術無學的「驕囂」（嚴復語）時代，要想找到充滿人文關懷的思想著作並不那麼容易。

作者對「縱慾」與「虛無」是這樣理解的：

如果對於意義的渴求是一種慾望，縱慾指的便是對於意義的存在有太多幻覺、對於人類的作為創造意義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對於此，當縱慾的亢奮高潮帶來的只是虛脫挫敗，幻覺與信心會在瞬間崩解，淪為對於一切價值的麻木虛無心態。在除魅後的近代世界裡，意義的問題逐漸浮現，解決的唯一資源又只剩下作為主體的人自身，縱慾與虛無之間的輪替交迭自然愈演愈烈，表現了人類每一次建構意義時從張狂得意到失敗喪志的循環。

縱觀人類的一生，無論誰都在無一例外地尋求著生命的意義，而「學術」與「政治」則是這一尋求中最受矚目的兩大「工具」。如果說「意義」是彼岸，那麼在世人眼裡「學術」與「政治」則是滑向終極的諾亞方舟。然而，世間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令人尷尬。學術的「先知」和政治的「英雄」總是給人以虎頭蛇尾的結局。站在思想史的角度，我們從來都不缺乏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先知先覺，更不乏扮演著「內聖外王」和新「內聖外王」的救世主。然而，審視一下近代思想史上的聖哲和偉人，他們不是在破壞了舊有的「迷魅」後讓人重新走進全新的「幻覺」生活，就是在利用「武力」這一「魔鬼的力量」將人類以天堂的名義引向地獄。

事實上，在縱慾和虛無的兩極世界裡，我們難以找到拒絕庸俗、敢於擔當的自持者。或許，這就是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所說的思想史上的兩種情形：「魯莽的樂觀」和「輕率的絕望」。啟蒙先驅的偉大，幾乎被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稱頌了一個世紀，救亡圖存的英雄則被我們毫無疑義地當作精神圖騰近一個世紀。何以故？那是幾個世紀以來牽引芸芸眾生走向現代性的偶像。曾幾何時，有誰懷疑過這一追求不是蠱惑或逃避？機會與責任在非此即彼的偏執中永遠擺不平。意義的尋求者，何以如此軟弱？作者精闢地申述說：「縱慾者靠奢侈的希望而生，不敢正視希望破滅的事實；虛無者則放棄一切希望，不敢在廢墟中有所堅持。」回眸彷彿就在昨天的百年中國，我敢說，錢先生這個學術概論是我目前所能閱讀到的最鮮活的筆墨。及此，當我解讀經典又要面對現實時，站在思想史的視角，筆者不禁想起巴枯寧（Mikhail Bakunin）那句充滿智能的警示：「歷史的唯一用處是教我們不要再這樣了，我以為讀史的好處是在能預料又要這樣了。」（轉引自周作人：〈代快郵〉，載《談虎集》〔上海：上海書店，1987〕）

讀《縱慾與虛無之上》，能從中理出一條充滿悲情和憂患的線索。這正如錢先生自己訴說的那樣：「歷史的沉重與冷酷，畢竟比單純鋪陳概念更能揭露真實。」正是歷史的沉重和冷酷招惹了作者的憂患和悲情。他期待揭露歷史的真實而示諭世人，但他卻完全不依賴簡單歷史事實的羅列。筆者發現，恰恰是他那靜態的理論敘述，卻發揮著比我們那些「勝於雄辯」的事實更為堅挺的雄辯力量。它散發著比事實本身更「事實」、也更適時的輿論威力。老實說，達到這一境界者並不多見。在大陸一再反對學術浮躁並強調學術規範的當下，我們從錢先生的著作中找到了一種學術的魅力、底氣和借鑑。這也迫使我們進一步追問：究竟甚麼是真正的學術？甚麼才算真正的學術？

驕囂時代的學術總有這樣一種共性：在故作高深的背後，其實就是一種犬儒式的躲避。錢永祥以個人自身的寫作實踐提供給我們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精神投影。他主張知識份子應該接受「差異」、「寬容開放」以及「非權威的共識」，「總而言之，知識份子一本公民本分，進入公共領域發揮他們的說理本業與文化素養，為公共論述提供亟需的理知資源與說理典範，構成了公共型知識份子。」躬身自問，我們的問題意識有多少？我們的人文情懷有幾分？我們知識份子特有的也是應有的良知，是不是存在知識的銀行裡吃利息去了？就在大陸知識份子你爭我奪地為自己的話語體系尋找依據的當下，還是旁觀者清，他接著「公共型知識份子」的責任說：「在漢語世界，公共型知識份子的出現和成長，就還是一個亟待努力促成的理想。這個理想，由於關係到社會生活的公共化、民主化，重要性並不亞於任何體制的改革、或者民主的鞏固。」儘管錢先生沒有高調的學術「規範」，也沒有嚴厲的批評責問，可就在他表達促成公共型知識份子的理想期望中，我們體味到的是他遠離「概念鋪陳」的用意：

用黑白善惡的詞彙描述社會現象、區別不同的立場，雖然是人情之常、卻也是知識份子應該避免的廉價武器。這不是說我們可以放棄道德觀點，而是說在從事公共性的論述說理之時，以普遍與平等為念的道德要求，應該對於發自實質價值信仰的道德裁判、發自道德優越感的譴責和傲慢有著節制。前者以程序和權利為形式，維持了公平與平等，後者則注定會傷害公共領域的差異與共識原則。道德優越感如果進一步隨鬥爭的需要而蔓延，僭稱自己為清流、為社會良知所在，認為自己所支持的立場屬於正義的一方，他人則甘於沉淪、甘為鷹犬，自然就更有借道德口實裹脅公共論述的危險。

順著「縱慾」與「虛無」的路徑固然可以順藤摸瓜，但更重要的還是要抓住作者言說的內在

體系或言說脈絡。副題「現代情境裡的政治倫理」為我們的閱讀提供了路徑。原來，圍繞著「縱慾」和「虛無」兩個精神現象，作者從倫理道德的視角，力圖透視出現代性與價值實踐的關聯。這一學術命題已經是化解為作者的心理積澱與學術訴求的精神底蘊。在看似零碎、孤立的一篇篇或長或短的文章表像背後，其實貫穿著這種精神底蘊的圓融。作者以其學術積累，無論是圍繞平等、多元、公共性等關鍵詞的論述，還是信手拈來的議題，都盡顯萬變不離其宗的學術氣脈。一以貫之的體系使得作者的學術思想形散而神不散。所謂「通則不隔」，其此之謂也。這本以文匯形式出現的文集，並沒有影響文本自身的一體化和系統性。

作者對現代性問題有這樣的認識：它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思想問題，更是一個倫理、政治問題。作者認為，脫離縱慾與虛無的氣味後，一個重要的精神指歸就是由平等的個人進行公共論述。他進一步指出：「現代性倫理，就是對於這樣一個批判性的烏托邦的認定。」

鑑於作者是從道德倫理的視角看現代性，因此他的思考中總帶有鮮明的羅爾斯（John Rawls）痕跡。在自由主義的理念裡，自由與平等是兩個重要的思想砝碼，而且對何者優先的不同倚重，會導引出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與羅爾斯的分野。世紀末開始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雙方面紅耳赤的論爭，其焦點在哲學理念上則是自由與平等的砝碼之間的錙銖必較。這不但在學術界構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緊張，甚至波及到政治意識形態、民間社會各個角落——要公平還是要效率。以致於一時間，大陸的語境一下子彷彿置換到了西方。何種自由主義？誰的自由主義？針對大陸學界很是熱鬧了一陣子並且在自由與平等之間的拉鋸戰，錢永祥先生從「自由的價值何在」開始追問。假如自由概念本身不能為多元的自由價值提供孰主孰次的尺度，假如自由本身不具備價值，那麼就要從「人的最高利益」出發看其保障的程度或達到的效益。在討論了「自由的價值」這一命題後，作者接著便將它落實到「抽象的平等原則」如何具體化。儘管社會有著不可迴避的遏制個人選擇機會的平等難題，平等作為自由主義的傳統以及人文關懷，確實不可或缺，也不可低估。這也是錢先生反對將自由與平等簡單孤立起來做「擇一而處」的根本緣故。

應該看到，除卻上面有針對性的敘述外，錢著中關於思想史的諸多分析看似與大陸學界的問題無關，但透過現象都能看到我們的學術影子。在這個意義上，我願意向學界推薦這本人文關懷和學理細密的論著。在學術咒語層出不窮、驕囂之風日熾的今天，也許《縱慾與虛無之上》不故作高深的意義尋求，已經向我們提供了一種直觀的學術規範。這個學術規範的意義就在於：我們人文或者說公共知識份子為甚麼要從事學術？從事甚麼樣的學術？怎樣從事學術？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儘管我欣賞作者的「通」以及找到了自我透視現代性的獨特視角，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完全同意其觀點。正如作者預感到的那樣，我對其倚重羅爾斯而疏遠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傾向就多少有點不理解。我想，像錢先生那樣具有「平等的關懷與尊重」情結的知識份子如果多來大陸，會不會有新的倚重？或者說，透視視角會不會有所轉換呢？